



杨渡：以温热之笔讲述台湾故事

从消失的凯达格兰人，到带着小提琴的革命家简吉、在大时代的飓风中飘荡的简娥和汤德章，再到“二二八”中沉默的母亲林江迈、迷雾中的将军李友邦……《一百年漂泊》之后，台湾作家杨渡出版新书《在台湾发现历史》，再度以文学的笔触，用一个个故事串起了台湾史上的关键片段，温情讲述父辈和祖辈的生命与记忆。



日本殖民者初到台湾时，在街头卖东西的孩子

>> 从人的角度书写血肉丰满的台湾史

杨渡的家族祖先是清代大陆赴台垦荒民众中的一分子。杨家祖辈居住在福建，清朝前期，因与人发生争斗，为了避祸被迫渡海来台，靠租地耕种谋生，亲历了台湾的社会变迁。祖母感叹：“我出生是清朝人，生了儿子变成日本人，生了孙子变成中国人。”杨氏家族三代人各自的身份和出身，由不得自己。

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，杨渡祖父的三个兄弟的命运几乎就是日据时代台湾人的缩影：日语流利的三叔公被

调到大陆战场，担任法院翻译，战争结束后被当成日本人、汉奸，从上海一路乞讨逃回台湾；六叔公到南洋当工兵，被美军带回台湾后，一生追讨日本欠他的军饷；二叔公则在美军轰炸台湾时被炸断了一条腿。

1945年台湾光复后，杨渡的父亲不甘心一辈子当农民，先开了一间工厂做瓦，后来又凭着小学阶段的一点日文基础，自修锅炉制造，绕开日本的垄断技术，设计出各种新式锅炉。上世纪70年

代，父亲的锅炉厂建起来了，却因财务管理不善，欠了一堆高利贷，父母四处逃亡，在杨渡记忆中这是家中最为黑暗的一段日子。

根据父辈的故事，杨渡完成《一百年漂泊》一书。回顾自己家族的百年历史，他发现个体的家族史竟然与台湾史浑然结合起来，每个阶段的轨迹，每个人的生命，都如此鲜活清晰。《一百年漂泊》之后，杨渡继续尝试着从人、人性的角度，书写血肉丰满的台湾史。

>> 历史的复杂远超小说家的想象

“冷酷中有温暖，杀伐中有人情，毁灭中有希望。”在新作《在台湾发现历史》中，杨渡通过一个个台湾人的传奇故事，诉说着民族之间、人与人之间复杂而真实的历史。

台湾抗日志士李友邦是众多历史事件绕不开的一个传奇人物。李友邦出生于台湾一个大家族，因为抗日，他与伙伴袭击了日本的警察局，之后流亡到上海。只能讲日语、闽南语的他如何在上海生存呢？因为不会讲上海话，要带着图画去买菜，买活鱼就在鱼下面画一些水，买咸鱼就在鱼上画一些盐。信仰三民主义的李友邦南下广州，成为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，语言不通依旧是难题，听

不懂广东话，竟然在孙中山演讲时打起了瞌睡。不过，孙中山依然被李友邦的革命热情所感动，让他每周到廖仲恺家中学习国语。抗战时，李友邦组织“台湾义勇队”在大陆抗日，组织医疗巡回队，有效地扭转了台湾人在大陆军民中的不良形象。他还组织台湾少年团，在街头诉说日本如何殖民统治台湾，感动民众；抗战胜利后李友邦返台，死于上世纪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中。“因为这些人有生命、有个性、有感情，在风云激荡的时代里有作为一个人真正的感受。”杨渡希望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的生命来看历史。

日据时期，农民组合中闻名的女斗士简娥，父亲死

于日本人之手，她同母异父的哥哥却救了日本警察的孩子，而那个被救的孩子就是后来涉入台湾政治，在“二二八事件”中遭到枪决，示众数日不得收尸的汤德章。简娥与汤德章，两个境遇与命运如此不同的人，却都因不满日本殖民政府的歧视而走向反抗的道路。这二人命运的交织，也正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，台湾人与日本人复杂关系的写照。

在杨渡看来，历史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是非判断，人性的复杂带来了历史的复杂，“那情感的纠葛，国仇家恨的交织，个人认同的彷徨，为理想牺牲之壮烈，其复杂的程度，远远超出了小说家的想象”。

>> 原住民与移民潮成就今天的台湾

台湾的发展历史，充满了惊险，也伴随着苦难。

台北有一条“凯达格兰大道”，命名起源于台湾北部最早的住民凯达格兰人。几千年前，凯达格兰人定居台湾，成为“先住民”，之后的荷兰人、西班牙人、日本人以及明朝移民、清朝移民、1949年移民等七波移民潮陆续在这里留下了痕迹与记忆，才成为今天的台湾。

以1949年的大迁徙为例。国民党撤退到台湾，不仅带来了军队，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许多知识分子，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落地。这其中不仅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、雷震和周德伟等，有文化传统主义者唐君毅、牟宗三等新儒家，还有文化艺术的传灯人于右任、黄君璧、台静农等。知识分子在台湾各地高成低就，因为没有足够的机构可容纳他们。中科院史语所在仓库边搭几间违

建的房子作为临时研究室，吕佛庭、李仲生等人则来到基层教育机构教育孩子们。乱世之中，一个知识分子若能找到讲堂，文化的根脉就传承下去了。杨渡在著作《暗夜传灯人》中感慨道，正是由于这么多知识分子为台湾基层教育做出了奉献，通过教育下一代，把文化的血脉深深植入台湾这片土地。

1949年随国民党来台湾的人，已经在台湾生下第四代儿孙，如果他们都不能称为台湾人，什么叫台湾人？如果把这些“外来文化”都去除后，那什么才能代表“台湾”？面对不断挑起的“省籍之分”“本土之分”，杨渡不禁质疑。

杨渡认为，本土就是包容，就是移民文化的总和，是不断加入、不断淘汰、不断创新的过程。“因为包容，所以开创；因为开创，所以壮大；因为壮大，所以本土才有生命力。”

>> 卖烟女人的“和解”与“宽容”

1945年日本投降，台湾光复。10月17日，台湾岛民成群结队，拉红布条，以迎王师的心情，在基隆港迎接国民党军队，看到的却是一群垂头丧气的军人，腿脚缠着破布绑腿，拖着破包袱，扛着旧枪，身后背着锅碗瓢盆。此番景象令台湾同胞大失所望。

人们很快就发现，接收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是一个落后的政权，腐败问题严重。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经历过初步法制和现代化的台湾，此刻便有诸多不满，最终演变出1947年的“二二八事件”，成为台湾历史上一处巨大的伤痛。

杨渡发现近年来很多关于“二二八”的研究，如同历史叙述筛选后的简明大纲，难以触及事件真相，人们也在恩怨与仇恨中渐行渐远。在他看来，这一事件是台湾光复后所有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，并非“外省人”与“本省人”的冲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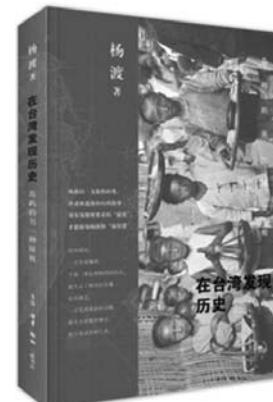
“二二八事件”的“导火线”是靠卖走私烟养活儿女的寡母林江迈，事件因国民党政府查缉私烟，并打伤烟贩林江迈而爆发。待事件平息之后，林江迈又回到事发地，继续靠卖香烟谋生。她每天早上出门前把头发整整齐齐地梳成一个小髻，插上一朵玉兰或者茉莉，保持着干净、

素淡的容颜，直至1970年去世，终年63岁。她生前绝口不提“二二八事件”，也不愿和家人说当时的情况，沉默走完自己的人生。

作为纪录片《还原二二八》的总策划，杨渡访问到林江迈的女儿——林明珠。受访时，林明珠已七十多岁，回忆起和母亲在台湾重庆北路一带卖香烟的童年往事，以及1947年2月27日事件爆发之际，她所见的一切，母亲被警察打伤的场面依然历历在目。

通过更进一步的采访，杨渡得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——本该怀着被迫害的痛苦度过余生的林江迈，竟然把女儿林明珠嫁给了事发当年的台湾省主席陈诚的侍卫、外省籍军人曾德顺，并得到了家族的祝福，一对夫妻恩恩爱爱地过了一辈子。

没有人知道林江迈为什么回到出事的地方继续生活，也没有人可以了解她怎么会原谅打伤她的警察以及背后所代表的“外省人”，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外省人，而且是警官。在政治之外，杨渡看到的是一个平凡母亲的释怀与和解，“如果林江迈都可以抛弃恩怨，选择自己的人生，为什么后代的人还要怀抱着仇恨走下去呢？”



《在台湾发现历史》
杨渡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